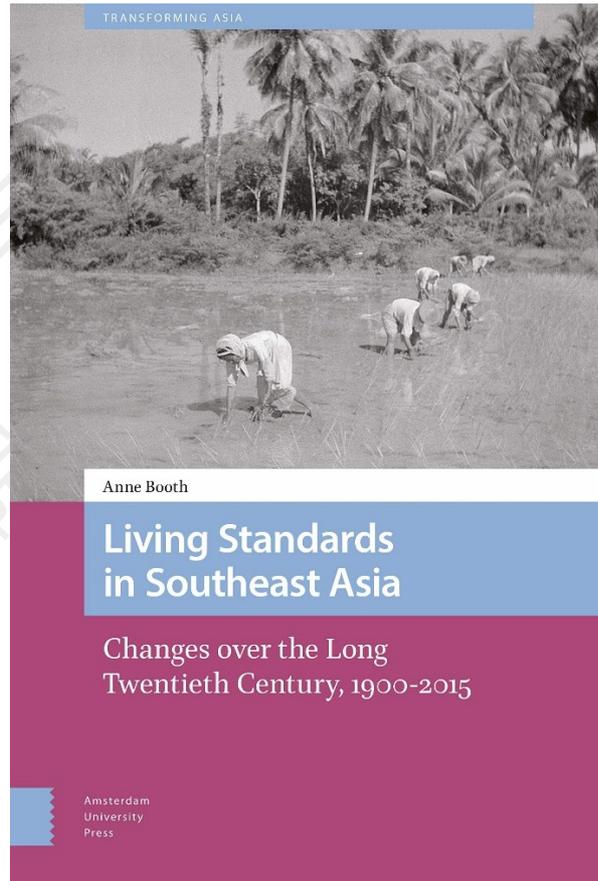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安妮·布斯《东南亚的生活水平：漫长的二十世纪变化，1900-2015》

编者按：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关于经济增长对生活水平影响的讨论中，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视了，这确实令人遗憾。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相当快的经济增长，甚至要快于同时期的中国和印度。在殖民时代末期，该区域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准自然实验室，用于研究不同的殖民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不断增长的国家产出转化为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引申出一系列关于殖民主义与福利主义的激烈争论。在定量方法被普遍使用的今天，这些争论往往又会各自基于许多“坚实”的数字证据，但有时却也会选择性地忽视数据采集与指标设计的可靠性与合理性。安妮·布斯（Anne Booth）所著《东南亚的生活水平：漫长的二十世纪变化，1900-2015》（*Living Standards in Southeast Asia: changes over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1900-2015*）对此做出回应。作为一名在东南亚经济发展领域耕耘半个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家，以及一名曾在亚洲发展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担任顾问的政策型学者，布斯对当前常用于衡量东南亚地区生活水平的各类指标进行了充分的反思，在对传统测度所依据的底层数据和估计方法采取严格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之上，梳理了整个二十世纪东南亚各国生活水平的分布变迁以及这些数字背后复杂的影响因素。对于读者来说，无论是希望利用这些重要数据展开定量研究，抑或是在进入田野前获取一些宏观上的把握，这本书都会成为任何有兴趣了解过去一个世纪东南亚居民生活状况之人的必读书目。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办刊物《东南亚研究》（*South East Asia Research*）于2022年3月发布荷兰瓦格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乡村和环境历史组助理教授皮姆·德·茨瓦特（Pim de Zwart）关于安妮·布斯（Anne Booth）所著《东南亚的生活水平：漫长的二十世纪变化，1900-2015》（*Living standards in Southeast Asia: changes over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1900-2015*）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在《东南亚的生活水平》一书中，安妮·布斯全面概述了目前衡量十个东盟成员国平均收入、发展程度和贫困趋势所采用的各类标准。布斯批判性地评估了各种发展和生活水平指标所依据的底层数据和方法。书中所讨论的计量指标之广让人印象深刻，包括了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基尼指数、贫困率、识字率、教育入学率、预期寿命、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等等。其主要目的是观察东南亚地区的生活水平（通过这些各种衡量指标）在长期内有多大程度的改善，以及哪些因素可以解释该地区内的不同模式。该书特别关注了政府政策在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

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了殖民时期东南亚的生活水平。布斯发现，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殖民地政府试图改善其殖民地臣民的生活，但往往只采用较为有限的手段，其结果喜忧参半。只有在菲律宾，大量的殖民地政府支出被用来改善教育，并以较小程度投放于当地人口的医疗。英属马来亚则在医疗开支方面脱颖而出。菲律宾和英属马来亚的支出带来了如下影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菲律宾的教育入学率在东南亚国家中最高，马来亚则拥有最低的死亡率。而在其他殖民地，尽管粗死亡率（译者注：粗死亡率即“crude mortality”，也作“crude death rate” [CDR]，简称死亡率，指一地区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全部死亡人数与同期该地区的平均人口总数之比）的确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过低的投入也使得这些成效极为有限。在殖民时期后期，东南亚各国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或许加剧了。第四章则指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萧条时期和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东南亚的生活水平都有所下降。而在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后，许多后殖民政府试图大幅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尽管许多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人均 GDP 衡量）实现了一些经济增长，但这并没有转化为更好的教育条件、医疗资源或住房条件；从全球比较视角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收入仍然较低。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些东南亚国家贫困和不平等状况的估算数据愈发丰富可得。在第五章中，布斯也更加深入地讨论了这些数据以及它们所存在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各项指标下的数据有时会呈现出难以调和的对立态势。例如，布斯讨论了这样一个困惑：菲律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据表明，在这几十年中，人均 GDP 大幅增长、食品供应改善、婴儿死亡率下降，然而这也同时伴随着贫困率增加以及仍无改善的不平等状况。贫困率的衡量标准取决于诸多假设和不同定义，这使得各国之间的比较难以进行。此外，布斯还进一步说明了东南亚国家的统计机构所采用的方法缺乏透明度，更深层次上入户调查则存在问题，这些进一步影响了相关数据的有效性。在第六章中，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红利并未在各类人群间得到恰当地分配：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中，不平等现象加剧，而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减贫进程也减缓了。1997 至 1998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加剧了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部分地区的贫困状况，而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贫困则影响较小。在第七章中，布斯试图解决二十一世纪初应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PPPs）估算国际可比贫困线的有关问题。尽管有人提出这些测量尝试是否应完全抛弃（第 206 页），然而布斯避免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混搭”（mash-up）指标也存在重大问题。

第八章概述了东南亚后殖民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而施行的各种政策。布斯讨论了旨在（至少部分）减少贫困的七种主要政策：土地改革、土地重新安置、通过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控制食品价格、税收改革、人口政策和权力下放。布斯解释了推行这些政策的原因，如土地改革出于土地分配不均的（殖民地）遗留问题，或土地重新安置政策出于某些地区人口过多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政策成效不一。开展计划的预算有限，或者预算分配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都是原因之一，但强大的政治反对派也可能阻碍效率与实施。在结论中，布斯强调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异性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发展良好，而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则发展相对较慢。即使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等经济大幅增长且减贫显著的国家，相当高度的社会不平等仍是问题。虽然总体而言，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减贫有关，但东南亚的减贫成效因国家而异，取决于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例如生育制度）。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表现和贫困程度在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布斯反对简单地将重心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率、寄希望于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因为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社会问题和政治不稳，或者让政治势力失去减贫的动力。帮助穷人与改善教育和健康的政策是有益的，优化的统计方法和衡量手段能极大助力这些政策的设计和有效执行。

《东南亚的生活水平》处理了一个棘手难题：将对生活水平的各类衡量标准及其深层问题的批判评估与对这些数字的解释结合起来。如能深入了解这些突出问题导致的预估误差大小，那将大有裨益。可以通过列出基准年的贫困情况、GDP 和不平等数据的合理范围来实现这一做法，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经济史的发展方向。尽管有这一小小的建议，但对上世纪东南亚发展感兴趣的人来说，《东南亚的生活水平》一书是不可或缺的资源。该书对海量文献进行了相当有益的介绍；这本书也向我们证明，没有人比布斯更了解东南亚长期生活水平的测度。此外，本书明确告诫，不仅对于东南亚研究学者，而且更广泛层面上对于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而言，都不应不加批判地使用生活水平的定量估计指标。确实，本书推荐给所有从事（历史）发展测量的定量研究人员阅读。

（英文原文见 Pim de Zwart (2022) Living standards in Southeast Asia: changes over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1900 - 2015,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30:1, 133-134, DOI: 10.1080/0967828X.2022.2041795.）

策划：宋培睿

编译：李庚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